

2000 傳播論文選集

2000



中華傳播學會 出版

T206-53
20053

港台書室

2000傳播論文選集

郭良文 主編



中華傳播學會 出版

感謝五南圖書公司對本論文選集所提供之協助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2000傳播論文選集 / 郭良文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中華傳播學會，2001[民90]
面；公分

ISBN 957-744-797-X(平裝)

1. 傳播 - 論文, 講詞等

541.8307

90009539

2000傳播論文選集

主 編：郭良文

執行編輯：葉蓉慧、夏春祥

出 版 者：中華傳播學會

發 行 所：中華傳播學會

地 址：臺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傳播大廈五樓）

電 話：(02)2236-9590

封面設計：黃蔚軒，對話盒子工作室

行政秘書：丁佳慧

2001年6月初版

全一冊 / 定價新台幣 30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序

2000 年，中華傳播學會的年會主題為「傳播研究 2000：跨世紀的回顧與願景」。在即將跨入廿一世紀之際，傳播社群應該有什麼樣的反思與展望？選擇此年會主題，可說是找尋傳播社群在跨入廿一世紀的意義。「回顧與願景」是一種歷史感：從回顧過去掌握現在的意義，進而創造未來的意義。它也可說是一種主體意識：在找尋意義的過程中成為自己的主人。此年會所涵蓋的子題包括：中文傳播研究成果的回顧與願景、中文傳播研究的本土化與原創性、中文傳播研究與傳播實務的契合、以及中文傳播研究的對話與整合等。這些子題在 2000 年年會的論文、專題討論、與論壇中，都有相當的研討。本論文集所包含的八篇論文，也相當程度地回應了這個主題的一些內涵。

第一部分「新聞學與術」包括四篇論文，其中林麗雲所撰寫《卻顧新聞所來徑，一片滄桑橫脆危：台灣的新聞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一文，探索台灣新聞史研究之發展，由於此類文獻相當欠缺，故本文扮演了先趨性的角色，此論文已發表於 2000 年《傳播文化》第八期。第二篇《黑道陰影下的報導策略》為陳順孝所撰寫，深入的分析了記者面對黑道與暴力脅迫情境下的因應方式與報導策略，揭發不為一般人所知之記者秘辛，此論文也已發表於 2000 年《傳播文化》第八期。第三篇由孫式文與鄧育仁所寫之《隱喻框

架：臺灣政治新聞裡的路徑隱喻》，獲得本會「2000 年傑出傳播論文獎」，本文使用隱喻的觀點分析臺灣的政治新聞內涵，在政治新聞的分析角度方面具有創新性，此文已發表於 2001 年《新聞學研究》第六十七期。第四篇《初探論述分析與傳播研究：兼論其在中文傳播研究上的前景》為倪炎元所撰寫，深入探討論述分析與傳播研究的關聯性及其在傳播研究上的應用，研究內容新穎而具有獨到的見解。

第二部分「公關、行銷與歷史」包括二篇論文，《90 年代台灣公共關係研究之探討—版圖發展、變化與趨勢》一文作者為黃懿慧，針對台灣公關研究的發展方向提出詳盡的剖析，對瞭解台灣公關學術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助益，此文已發表於 2001 年《新聞學研究》第六十七期。另一篇論文《台灣報禁政策對發行與送報之影響：一個時空辯證觀點的思考》，獲得本會「2000 年傑出傳播論文獎」，本文由郭良文與陶芳芳所共同撰寫，分析時間與空間的因素，如何在報禁解除後影響到台灣的發行與送報體系之發展，內容頗具創新性，此文已發表於 2000 年《新聞學研究》第六十五期。

第三部分「民意與社會」包括二篇論文，《媒介負面內容與社會距離對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影響》為羅文輝所撰寫，本文獲得本會「2000 年傑出傳播論文獎」，內容探討第三人效果中的認知面向，本文研究設計嚴謹，研究結果對媒介內涵與第三人效果間關係的瞭解有重要的貢獻，本文亦已發表於 2000 年《新聞學研究》第六十五期。另一篇論文《一背離？自救？——「暨大復學案」報紙與論爭議的語藝觀察》，獲得本會學生組「2000 年傑出傳播論文獎」，作者為謝文華，本文從語藝分析的角度觀察暨南大學復學案的報紙與論爭議，分析詳實而擁有創意性的詮釋，是一篇優秀的學生論文。

（另外二篇獲得學生組傑出傳播論文獎之論文，因聯絡不上作者，故很遺憾並未納入本選集之中）。

以上論文是從 2000 年年會 39 篇正式提報的論文中（不包括專題討論之論文）經過第二次評選的過程所產生的，內容也都經過作者之重新修正，由於其中六篇論文已先後發表於學術期刊之中，本會要特別感謝輔仁大學出版的《傳播文化》與政治大學出版的《新聞學研究》二刊物同意本論文選集刊載這些文章。同時，在此要特別感謝黃鈴媚秘書長、葉蓉慧與夏春祥執行編輯、以及丁佳慧秘書對本論文選集盡心盡力的付出。

2000中華傳播學會論文選集

目 錄

序言

第一編 新聞學與術

1. 卻顧新聞所來徑，一片滄桑橫脆危：台灣的新聞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林麗雲… 1
2. 黑道陰影下的報導策略……………陳順孝… 39
3. 隱喻框架：臺灣政治新聞裡的路徑隱喻……………孫式文、鄧育仁… 85
4. 初探論述分析與傳播研究：兼論其在中文傳播研究上的前景……………倪炎元…127

第二編 公關、行銷與歷史

1. 90年代台灣公共關係研究之探討
—版圖發展、變化與趨勢……………黃懿慧…169
2. 台灣報禁政策對發行與送報之影響：
—一個時空辯證觀點的思考……………郭良文、陶芳芳…225

第三編 民意與社會

1. 媒介負面內容與社會距離對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影響……………羅文輝…281
2. 一背離？自救？——
「暨大復學案」報紙輿論爭議的語藝觀察……謝文華…331

卻顧新聞所來徑，一片滄桑橫脆危 ——台灣的新聞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

林麗雲^{***}

《摘要》

本文旨在檢視過去五十多年來台灣的新聞史研究。它指出，在歷史的辯證過程中，不同時期的政治變遷下，台

* 本文初稿曾在「中華傳播學會 2000 年會暨論文研討會」中宣讀，承蒙評論人鍾蔚文教授及匿名評審提出重要建議，特此申謝。作者也感謝本論文選輯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

** 本文寫作過程中承蒙程宗明先生的討論及政大「傳播資料庫研究小組」劉昌德先生提供部份研究資料，在此一併致謝；作者也感謝研究助理古淑薰小姐協助收集相關文獻。

*** 作者林麗雲是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助理教授。

E-mail: maco1049@mails.fju.edu.tw

灣的新聞史研究可能有所轉變。在長期的威權統治下，新聞史研究以特定的觀點來編寫，排除不同的解釋，造成某種「社會失憶症」(social amnesia)。到了 1970 年代末期，當反對勢力興起，對立的觀點逐漸浮現。近來，在政治自由化的潮流下，社會上不同的團體開始重拾記憶，重建歷史，也帶來研究上的契機。展望未來，本文建議，研究者應以本土的傳播文化為主體，分析在歷史的過程中各種脈絡的文化如何在此交織並交融出特殊的傳播文化，以開闢這個學門的歷史視野。

關鍵詞：新聞史研究、新聞研究史、歷史與時代、歷史與政治

壹、為何要回顧新聞史研究

五十多年來，台灣的新聞與傳播研究，在前人的辛勤播種與揮汗耕耘下，已由一片荒蕪，轉為今日欣欣向榮的景象。例如，在老幹與新枝的傳承下，這個學門的研究產量及人力已有大幅的成長（鄭瑞城，1995）。然而，放眼望去，我們可能發現這片園地中，歷史面向研究的數量相當有限。它宛如花園中不為人顧的小盆景一般，稀稀疏疏三兩枝。例如，汪琪與臧國仁（1992：404）及羅文輝（1995：D34-35）分析過去五十年來台灣傳播學門的學術成果，結果發現其中歷史性的研究尚不到 5%。

造成歷史性研究明顯不足的原因，可能有二。首先是從 1960

年代以來，前輩學者到美國學習傳播主流典範中的研究方法後，引進美國社會科學量化的方法，從事定時性的研究，較不注重歷史研究（程宗明，1999a）。其次，在過去威權統治下，歷史性的研究頗為敏感¹。因此，即使有些研究者對新聞史感到興趣，但可能會因為政治上的考慮，而在面對歷史性的議題時，選擇繞道而行。

如果傳播學門持續忽略歷史面向的研究，可能產生幾個相關的結果（林麗雲，1999；2000）。首先，如果我們缺乏歷史性、動態性的研究，將無法透視本土傳播體制的問題。尤其對於鉅觀、控制面、制度層次、長期變遷的問題，我們將無法分析其性質與成因、轉變及轉向。如此，吾人將無從認識過去、了解現在、並找出未來的可能走向。

其次，如果研究者缺乏歷史方面的知識，可能很難涵養出研究中所需要的「歷史感」。這種「歷史感」主要包括兩方面（葉啟政，1994：73-76）。第一是研究者能反省自身所處的歷史情境如何形塑研究者個人的問題意識、方法論的立場、理論的位置，以及社會實踐的態度。第二是研究者能理解研究對象如何在歷史的過程中發展出特殊的文化形態。如果研究者沒有這種對歷史情境的反省力與洞察力，只把現有的理論或模式套在本土社會上，可能會造成「絲線把脈」的誤判與誤診²。

¹ 李鴻禧（1987：8）指出，過去政府疑慮「台灣史」及「台灣史研究」會提升台灣意識，甚或惡化為「台獨思想」，遂對「台灣史」及「台灣史研究」懷抱警惕戒慎的態度。

² 傳播學研究中「絲線把脈」的現象是由朱立教授所提出。在「中華傳播學會 2000 年會暨論文研討會」中「論壇討論：中華傳播學研究的過

再之，長期以來這個學門忽略歷史面向的研究，並未有系統地蒐集史料，因此文獻資料已一點一滴地流失，老成人物也一個一個地凋謝。可以預見的是，如果當下不努力，則日後將徒傷悲傳播史研究的窒礙難行。

有鑑於新聞史研究的重要性與急迫性，近年來部份傳播學者呼籲，未來應注意此面向的研究與教學（潘家慶，1997；程宗明，1999a；翁秀琪，2000；林麗雲，2000）。潘家慶更擲筆長嘆，謂「（傳播學門中）…歷史方面的研究，一片空白，可嘆！可惜！」（潘家慶，1997：2）。

所幸，目前部份研究者正邁出新步伐，從事歷史相關的研究，試圖揭開過去神秘的面紗。他們嘗試分析以往在威權體制下（主要是1949年國府遷台以來），國家如何控制媒體，並影響媒體的發展（例如，程宗明，1999b；林麗雲，1999）。可以預期的是，未來在研究者不斷的努力下，一個煥然一新、信而可徵的歷史圖像將逐漸形成。傳播領域中歷史面向的研究也將枝葉茂盛，花果豐碩。

當我們正要挖掘史料、重寫歷史時，有必要先展讀國內新聞史的著作，分析其探討的主題與論述。主要的原因有三。

首先，如前所述，過去五十多年來，傳播新聞史研究受到忽視。但是，仍有少數前輩學者以新聞史為題，發憤撰書並累積成果。前輩研究的軌跡可做為我們未來出發的依據。他們研究的精神

去、現在、與未來：學者對話」，朱教授提出此看法。他指出，在1980年代以前，居住在美國的華人傳播學者在研究華人社會的傳播現象時，往往挪用西方既有的理論與模式，套在當地社會之上，因此所做的分析並不完全貼近當地社會的本質，甚至有七成以上的分析含有謬誤。

與經驗也可做為我們師法的對象。經由這樣的回顧，我們將能鑑往知來，也會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看得更高、更遠。

其次，我們回顧過去新聞史後，將可了解整體而言目前新聞史所勾勒出來的圖象為何？這個圖像有什麼問題與限制？還有哪些面向是尚未觀照到的？這些部份正是未來研究者應能著力之處，因為正如英國文化史家 Burke (1997: 59) 所言，歷史學者的工作「即是把人們可能會忘記的事情告訴他們」。經過這樣的檢討與反省，我們將能在新聞史的研究領域中，再闢新圃，栽出前所未有的花果，達到前人未及之境。

再之，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回顧過去五十多年來新聞史的寫作，我們可了解現有的歷史知識具有哪些的特質？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其形成與傳承？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歸納出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過去五十多年以來，台灣的新聞史研究之主題與論述有何轉變？這些轉變又給我們以怎樣的啟發？

貳、分析架構：歷史研究與時代

如上所述，本文主要分析過去五十年來台灣的新聞史研究，是屬於史學史的分析，也是歷史學研究的一種。在歷史學的研究的途徑中，*解釋的途徑*主張研究者應提出自己的解釋架構，做為分析的起點，以整理史料，並讓史料不斷地修正此解釋架構（林麗雲，2000：44）³。循此途徑，吾人在研究新聞史的書寫前，將先從相

³ 拙作〈為台灣傳播研究另闢蹊徑？傳播史研究與研究途徑〉（林麗

關的文獻中，尋繹出可能影響歷史寫作的因素。有了學理上的基礎，我們將能對本文所要探討的案例提出較有力與較有意義的解釋。

首先，自從 Ranke 提出客觀的史學研究方法後，客觀學派即對史學研究有重要的影響（Appleby et al., 1995）⁴。這個學派基本上認為，史學家的主要工作是挖掘史料、弄清真相，然後不偏不倚地、客觀地、完整地呈現真實，讓「歷史自己說話」（Ranke, 1970：57）。在此假定下，這個學派認為，歷史是對過去的原音重現，歷史的書寫不會因為任何因素（如史學家個人偏好、或時代變遷）而有所不同。

但是，這種看法卻忽略了史學研究與時代的關聯（余英時，1979：2）。正如 Burke 指出的，歷史書寫是一種「社會的記憶」（social memory）。在概念上，正如集體記憶的研究者 Halbwachs（1992：182-183）指出的，這類記憶不僅是個人的心智活動，更是由社會團體共同建構的。以史學家的工作而言，他們會受到其內在基模（schema）的影響來選擇題材、解釋資料及呈現過去；而他們內在基模又是受到所處時代的影響，因為史學家是社會的一部份，也是社會的產物⁵。

雲，2000）分析傳播史研究的三個主要分析途徑（歷史主義的、客觀的及解釋的），包括其意義、淵源、優點與限制。在此不再贅述。

⁴ 這個學派也正是余英時（1979）所說的「史料學派」；它對中國近代的歷史研究有重大的影響。

⁵ 正如 Carr（1987）指出的，要了解歷史著作，必先了解作者是誰；而要了解作者是誰，則必須了解作者的時代背景。

因此，歷史作品可能會受到時代因素的影響⁶。例如，當 20 世紀初，大英帝國還坐擁「日不落國」的尊榮時，英國歷史學者多相信，歷史將是直線前進的，一如帝國國勢將持續蒸蒸日上（Carr, 1987：43）。但是一次大戰後，英國國勢日衰，英姿銳減，英國史學家 Toynbee（1963）於是提出與前人不同的史觀。他認為歷史的變遷並非直線前進，而是循環的。之後的英國史學家普遍也認為歷史的發展並沒有特定的型態。

其次，再就社會中權力運作的過程來看，歷史的書寫可能會受到一個時代中的社會權力影響。正如人類學家 Douglas（1986：112）說的，「任何體制想要維持良好的狀況，就必須控制其成員的記憶」，讓他們忘記一些經驗，特別是那些可能危及體制正當性的部份。這個過程也如 Gramsci（1979a，1979b，1983）所說的「爭取文化霸權」（hegemony）；也就是說，社會中的權力集團（power bloc）傾向控制意識型態，以維持在社會中的優勢地位，而歷史書寫即蘊含著認同等意識型態的因素。

以國家社會而言，每個時代的統治者大多會試圖影響歷史的書寫，以建立國民的認同及共識。例如，Appleby 等人（1995：91-99）指出，美國在建國的前夕，社會中包含不同的族群，各自懷抱不同的信念，追求不同的利益，並沒有所謂的全民共識；然而，當時「愛國」的歷史學者卻編織一套「美國人的共同傳統與精神」，為「美國」建立了 Anderson（1999：11-12）所說的「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即讓分散各地、互不相干的住民產

⁶ 即使歷史學者想要超越時代的限制，他們也必須深刻地反省其所處的時代。

生「同仇敵愾」、「同舟共濟」的情感。這些歷史學者指出，美國是啓蒙運動的產兒，爲爭取自由而奮鬥不懈，這種奮鬥最具體的實踐則是反殖民運動及「獨立宣言」。爲了讓這種說法顯得強而有力、信而可徵，歷史學者把原本互不相關的事情與傳說接連起來，打造美國的民族英雄，並把他們界定爲全國人民的共享記憶。這種歷史書寫召喚國家社會中的每個人、點名每個人，讓每個人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知道如何成爲國家社會中英勇的份子。

當社會用特定觀點來解釋過去時，某些觀點可能受到忽略。尤其當這些觀點不利統治集團時，可能會被斥責爲「邪說異端」。統治團體甚至必須銷毀某些版本的歷史，嚴禁某類的歷史寫作，或限制某些議題的談論。人們可能會因爲驚嚇過度而必須學會自我監控（self-censorship），三緘其口，保持沉默。久而久之，某些版本的歷史或人物可能不見經傳，灰飛煙滅，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中。Burke 稱這種情況爲「社會失憶症」（social amnesia）（Burke, 1997：57）。

所幸，「社會失憶症」的患者並非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他們雖然不能公開追憶過去，但是被壓抑的歷史可能仍然埋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在其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層次。他們在不經意的時候，可能會想起過去的種種。Burke（1997：57）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來說明這種情況。根據他的親身經驗，保加利亞曾歷經多次革命；每次革命後，新政府都會改掉街道名，重新用具有革命意識的字眼來命名，並全部換掉路標，目的是讓人們完全忘記舊時代，隨時隨地記得效忠新政權。但是，當 Burke 向路人詢問舊街道的所在時，他們還是能不假思索地指出正確的位置。換言之，雖然舊街道名字在官方的地圖上被塗去，但是它們在人們腦海的舊地圖中並未立刻消

失，正如被壓抑的記憶很難一筆勾銷。

因為被壓抑的記憶不會立即消失，所以「社會失憶症」並非無藥可救。假以時日，意識底層的記憶可能會被召喚出來，與主流的記憶對抗（Shotter, 1990：128-131）。特別是當權力中心不穩時，人們會開始侃侃而談，不再害怕說出內心真正的想法。因此，底層的聲音會重新發聲，挑戰過去的文化霸權。例如，美國自 1960 年代越戰失敗後，社會運動迭起；再加上教育普及後，部份非白人、女性、勞工等背景的人進入學院。這些過去處於邊陲位置的人開始為自己尋根，重建記憶，也為弱勢者發言。這段時間，美國史學界「由下而上」的歷史書寫蔚為風氣。研究者不以政治精英為研究主題，而以受壓迫的常民百姓（包括婦女、兒童、勞工、弱勢族群）為探討對象，分析其人口的變遷、生活型態與工作情況等（Appleby et al., 1995：135-139）。這時，弱勢者的記憶可能會被吸納，甚至成為主流。因此，從歷時性的觀點而言，歷史的書寫可能是一個動態的辯證過程。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由於社會中的權力運作，某個時期中，歷史研究可能關心特定的主題（如，政治、社會或文化等），追憶特定的人（如，精英或常民），或提出特定的解釋（如，何者為王？何者為寇？何者為英雄？何者為梟雄？）。同時，在選擇性的機制下，某些主題可能被遺忘。但是，當物換星移、高谷陵夷、世事變遷後，被遺忘的部份可能再被拾起，受壓抑的也可能得到紓解。因此，在不同的時期，歷史研究關心的主題及提出的解釋可能有所不同。